

中美建交30周年，恢复高考3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

纪念我们的三十年

2008 US-China Forum & Gala

Commemorating and Celebrating
30 Years of
Normaliza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China's Economic Reform & Opening-up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Sunday, November 23, 2008
2:00 PM – 6:00 PM (FREE forum)
6:00 PM – 11:00 PM (gala)
Bethesda North Marriott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
5701 Marinelli Rd. North Bethesda, MD 20852

邀请函

美国华人专业团体联合会及大华府的侨学界将于今年 11 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万豪大酒店联合举办《回顾与展望》大型纪念活动，纪念中美建交 30 周年，中国恢复高考 30 周年，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我们诚挚地邀请您作为贵宾参加这一盛会。

三十年见证了中国的历史性巨变。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时代，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三十年前中美双方在北京达成了建交协议，宣布从 1979 年 1 月 1 日起，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三十年前中国关闭了多年的高考大门重新开启，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是中国出国留学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又是中美建交的见证人和受惠者。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将相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回顾人生历程，畅谈事业家庭，展望美好未来。

这次纪念活动的内容包括《21 世纪的中美关系》论坛，《三十年再相会》文艺汇演、《历史的瞬间》图片展、《开放与未来》报告会和《难忘今宵》招待晚会。届时将有美中两国的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等专家学者、各界名流出席。新朋老友欢聚一堂，旧雨新知互诉衷肠。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将有诸多机会接触来自美中双方的各界人士，通过交流促进美中友谊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企业界人士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寻找合作空间与伙伴。

美国华人专业团体联合会(华专联)是一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登记注册的中美科学家和专业人士所组成的综合性联合体。华专联成员团体为各专业协会和组织，代表的专业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教育,信息工程,网络,通讯,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生命科学,生物医药,现代医学,交通,环境保护,金融投资,财会,法律,艺术,工商等各个方面，代表了 20,000 多名富有实际经验的优秀的旅美专业人士。

我们真诚地邀请您参加此次盛大的纪念活动。如有问题或要求，敬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着与您于 11 月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相聚！

敬礼！

美国华人专业团体联合会会长倪涛博士



美国华人专业团体联合会理事长林民跃博士



2008 年 8 月

Programs

2:00 PM **Opening Remarks**
Shuigeng Xiao, Co-chair, Forum Organizing Committee
Minyue Lin, Board Chairman, UCAPO
John Dickson, Chair, World Trade Center Association Peace and Stability through Trade Committee

1. Forum

2:15 PM **Session I: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up”**
Session Chair: Hua Wang, Chairman, World Bank-IMF Chinese Staff Association
Speakers:
Jiayi Zou, Executive Director, World Bank
Shangjin Wei, Professor and N.T. Wang Chair in Chinese Business and Economy at Columbia University’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Li Haiyan, Counselor for Economic Affairs, China Embassy at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hina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William Chang, Program Director,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Yibin Mu, Senior Capital Market Specialist, The World Bank/IFC

3:45 PM **Networking Break**

4:15 PM **Session II: “30 Years’ US-China Relations and Prospects in the 21st Century”**
Session Chair: Yeqing (Victor) Li, President, The China Society
Special Video Presentations
Daoyu Li,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US
Speakers:
Matthew James Salmon, US Congressman (Arizona-R, 1996-2001), Vice Board Chairman,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Martha Holdridge, Widow of the late Ambassador John Holdridge (Deputy US Chief of Mission under George H. Bush to China 1973-75,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Jiawen Yang,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Zongyou Wei, Fulbright Scholar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ssociate Professo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Diplomatic Affairs
Jin Ju, Minister-Counselo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Embassy at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Riley, Former Vice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oard Chair, Internet Equal Access Foundation

5:45 PM **Forum Adjourn**

2. Gala

6:00 PM **Co-chairs:** Patrick Lu, Tao Ni, Lili Zhang
Keynote Speakers:
Zhou Wenzhong, China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Faleomavaega Eni, US Congressman (American Samoa-D, 1989-), Chairman of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 the Pacific,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纪念我们的三十年》征文

永远的记忆-77年高考

汤斌

四十不惑，五十已开始知天命，我们这些参加过77年高考的人们，转眼之间就到了一个有资格回忆往事的年龄。这些人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心灰意懒之人或多或少都会用回忆打发些日子，并从中得到一些快慰。一生到此，要说光荣和骄傲的事情，总会想到“77年那年我们高考”了。

翻开历史的画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年代。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恢复中央工作，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后教育部形成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义》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份文件。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的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是从停止高考开始的，整个运动期间，“教育革命”的口号不绝于耳，高校是受文革蹂躏最重的地方，如果真有拨乱反正的想法，也应该从教育领域开始，尤其是应该拿大学招生的办法和标准开刀。

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一场从未有过的特殊高考。从1966年到1977年整整十年，废除高考制度，社会上积压了一大批求知若渴的青年。以至于77年报考人数高达570万人。年龄大的算是“老三届”，大多30出头，年龄小的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十六七岁，年龄差距如此悬殊，有的是父子同场考试，有的是老师与学生同场竞逐，真是少有的奇观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得知国家将恢复高考的消息，大概在1977年10月底，那时我已经在乌鲁木齐齐郊区的板房沟公社建新大队插队两年多了。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近30年，但那时的情景却仍历历在目。我记得新疆乌鲁木齐地区的考试时间定在12月份，迎考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只有一个多月。所幸的是我所插队再教育的地方属于比较寒冷的半农半牧山区。冬季农民休闲时间比较长。这个可供考试的时间，正好是我们那里农闲时间的开始，比较好请假回家复习。也就是说临考前一个月，我们能够获准可以回城“突击复习”，

1975年高中毕业，就没想过上大学的事，道理很简单，我们那个年代虽说是高中毕业，从小学到高中实际上只读了4年书。小学上到三年级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因为小学生太小不可能像我们的“红卫兵”大哥哥姐姐们那样闯天下，只好待在家里“停课闹革命”。到了上初中的年龄，又号召我们“复课闹革命”。所谓的“复课闹革命”就是天天学毛选，背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语录。还参加一些社会上的，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的“三反，五反”活动。直到邓小平第一次平反，就又给我们了一年的学习机会。接着邓小平又被打倒，我们的学习又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就只能学工，学农，学军，直到高中毕业。回想起来还真有意思，高中毕业了，没听说过什么叫做“微积分”。想想看这样的水平上大学，考大学会是个什么滋味。

没想上大学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因为我们家庭成份高，老爸属于黑五类。罪名包括资产阶级臭老九（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新疆解放后的认可的第一代工程师），走资派（一家国营化工厂厂长），国民党残余杂孽（曾经参加过国民党部队，参加过三青团）。因为这些，在“文化大革命”曾被开除过党籍。虽然后来又平反，但在那个“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年代，说成个天，也过不了政审那一关啊！因为老爸的问题，我们全家兄弟姐妹四个没有一个能够幸免留城，都光荣的插队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有参加77年高考的想法，完全是逼出来的。由我爸他们厂一起来插队的共有5个男生。其中4个在77年的3月至8月期间抽调到工厂当了工人，就留下了我这个表现好的黑五类子女，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当时心理很不平衡。回想当初，如果有人给我一个哪怕是回城

当锅炉工的机会，我都会放弃 77 年参加高考的想法。谢天谢地上帝没有给我这次机会，却让我抓住了参加 77 年高考这根救命稻草。

那时除了考试的时间和科目，其他的有关高考的信息几乎一无所有。没有人告诉你考试的范围有多大，考试的难度系数是多少，没有人为你辅导、帮你答疑解惑，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我们的一切所能把中学的课本找出来，不分昼夜翻着看。我对自己没有一点信心，说我是瞎猫碰耗子也行，说我是背水一战也罢，反正是豁出去了。

谈到高考报志愿，我记得新疆当时也是考前填报。那时哪像现在，如何填报志愿已经成了一门高深的专业技巧，需要参考大量的数据资料和历年的分数分布曲线，简直跟科技攻关差不了多少。根本就没有“一本、二本”、“提档线”之类的概念。当时别说报考专业，能认识的大学就那么几个。北大，清华当然认识了。因为“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新疆的几个大学当然也认识，但也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知道的。当时我记得新疆大学是红二司”造反派“占领着。其它几个大学如新疆医学院和新疆八一农学院都被三促”保皇派“占领。文化大革命初中期

天天看这它们“文攻武卫”。至于什么专业，在 77 年招生之前没人知道，我本人根本就没想要知道，

我们那时真是“无知者无畏”。那年我和小我两岁的妹妹同时报考大学。考前妹妹来找我商量我们应该报那个大学，什么专业。我想都没想就说，你的文笔好，就报考北大吧。没成想还真行，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 77 届北大法律系。等明白过事来以后，回想起当初的报考专业和学校，我妹妹说：那时胆真大，真有点瞎猫碰了个死耗子的感觉。

我的填写志愿过程要比我妹妹稍微复杂点。看着可报学校和专业的册子，不知该报什么。因为我们的脑海里没有学校的档次或专业的好坏这个概念。大多数看不懂，有的觉得没意思。随手翻来复去，发现有个专业挺有意思，同济大学工业及民用 建筑专业。我觉得这个专业比较适合我。我们再教育时经常有盖房子的工作。每次生产队长都让我当大工。说我砌墙砌的直，是个当大工的料。而我们其他小年轻只能做小工，给我们几个大工，负责递砖头和泥料等。我想我对建筑行业有”天赋”，选择这个专业准没错。现在想想真好笑，但当时确实是这么做的。

考完试大概不到一个月，应该是 1978 年的 1 月初。上面来了通知让我们去体检，我和我的几个拿到体检通知的朋友一起去新疆的北门医院体检。除了体检外，有几个招生办的领导给我们每个人还发了个表格，并告诉我说：现在农林院校的名额，还没有报够，可以补报专业。你们拿到体检通知，并不等于被录取，至少还有 10%要被淘汰。但你们补报了农林专业，你们就肯定能被录取。我和我的朋友一听这个，觉得为了保险起见，决定还是补报。我们拿来他们给我们提供的农林院校的报名册子。找来找去，每人挑了一个搞不明白的专业，我的朋友选了一个东北林学院野生动物保护专业。我选择了新疆八一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结果”如愿以偿”，分别被我们补报的专业选中了。一直没有搞清楚，我们是否就是那些将被淘汰掉的 10%呢？还是只要你补报了农林专业，其他专业都得让道，农林专业有选择优先？

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知青而言，好似鱼跃龙门。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 77 级大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看到过去无法借到的书籍，就像饿虎扑食般地享受知识盛宴。同学们都明白，历史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机遇，因而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也特别强烈。这些年我常常想，如果没有 77 年高考，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又从事什么职业呢？我们这个年龄把假想拉回到过去，似乎不太现实，因为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对我们年轻时的行为会有那么多的后悔，可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会参加 100 次的 77 年高考。

77 年和我一起进入高考考场的朋友们，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在人生坐标上，分化出了不同的道路。这次高考不仅仅改变了数十万青年人的命运，而且对共和国的二十年、三十年、乃至四十年产生深远影响！77、78、79 这些“新三届”学生，弥补了国家十年的人才断层，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如今他们都处于重要岗位，担当着挑大梁的角色。许多留学海外的同学，学业有成、学术抑或技术颇有建树。一点也不夸张的说：1977 年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开端，对国家是如此，对个人也是如此。

希玲，我的朋友

海伦

我认识希玲是在1976级卫校工农兵学员的课堂上。

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会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我是作为替补生在胜利的十月入校的，四人帮刚垮台，22岁的我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又不清晰。

记得那是在农场上山下乡三年多以后，招工终于轮到了我，知青点负责人对我说：“你得到农场工人的推荐了，可以去宾馆作服务员。”“作服务员？”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了极度的失望，泪水竟然滑落下来。看到我并不开心，工人出身的知青点负责人有些出乎意料，他说：“唉，你还不高兴，去宾馆多好。”话锋一转，他又说：“哎，不然你去读书怎样，社来社去的中专，医士班，但是不包分配的。”我顿时喜笑颜开，我想读书，不管以后会怎样。

就这样我进了学校，同希玲在同一个班，听说她是市里一家小工厂推荐的。希玲看起来很健壮，她的眼睛不大，长长的，弯弯的眼睛常常笑着，露出自信和一丝挑衅；她总爱抿着嘴，嘴角一闪一闪地扬起，走路步子很大，却是轻盈跳跃的步子。她刚20岁出头，显然活力四射。当时那个班里，几乎全是女生，那时候，我和希玲都不是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骨干学生，我们属于看重学习，又爱玩的一拨，但我们起初也不是要好的朋友，我和李姐她们在一起，李姐出身名医世家，好学勤奋，思维敏捷，是班里的学习明星。

让我和希玲走到一起的正是77年高考。四人帮倒台后，当时的76级学员经历了各种政治活动，一波又一波的游行，讨论等等。好多事情翻来覆去，我都淡忘了，至今仍清晰记得的是一些苏醒和感动，比如当校园的高音喇叭放出“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那种久违的，飘落心田的轻柔音乐，荡涤了文革十年留下的干涸；又比如飞扬绚丽的文艺片“春天”，让坐在露天电影坪的我目不暇接，可是这一切，都比不过77年高考恢复带来的震撼。

我始终记得，在操场的一角，一张长椅上，我捧着报纸，报纸上面载满了招生的学校，专业的名字，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的门都敞开了吗？不再谈出身，可以“自己报名”吗？不再划定学校，专业，可以自己选择吗？轻易地，从初中开始，文革十年灌入脑海的按党和国家统一规定走人生之路的无奈和无助褪去了，青年人天然拥有的对人生和未来的憧憬升了起来，我觉得那报纸上所列的是不可抗拒的诱惑，正是我要取得地方。

我站起来，对了，我要参加高考！

消息传开了，在全班近五十名学生中，与我有同样决定的还有一个，就是希玲。李姐很想上大学，可是她因文革中断了中学学业，只有初中学历，不敢贸然应试，当时，整个卫校有四个人想报名，除了我和希玲，还有另一名别班的学生和一位青年教师。可是学校不同意我们报名。

希玲和我走进了校长办公室，找到老校长，一位南下干部，他严肃地说：“这是国家选拔人才，你觉得你是人才吗？”当时我们一心要参加高考，也管不了太多，我们回答的很直接了当，“考上了就是，考不上就不是。”

我们终于报了名，我和希玲开始了学习，她的数学，物理明显胜过我，反应能力也很强，她很自信。高考的那天早晨，李姐给我买来了我爱吃的米粉，我和希玲一起走进了考场，那时候的中国人，十分可爱，而又被极“左”路线压抑太久，我们的作文考试题“心中有话对党说”就像一条渠道，引出了万千考生心中的激流，我记得我在考场挥笔疾书，监考的老师居然不断地停留在我身边，一页一页地等着读我刚完成的文章……

可是我和希玲再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我们都没被录取。一个偶然的时机，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被作为未毕业的高中生送入考场的（尽管我们已经高中毕业数年，并且下过乡，进过厂了），我们每科成绩都必须达到专为在校未毕业高中生特设的分数线，才能被录取。好在77、78级高考只差半年，我们抖擞精神，准备再战。这回，我特意找到原来下乡的农场，按照“社来社去”的政策，我那时仍是一名知识青年，可以以此身份报名高考，希玲试图从她原来的工厂报名，但却被工厂领导拒绝了，无奈的她无缘参加78年高考。

接下来我独自投入了紧张的补习，我在文革中上的中学，学的东西太少了，连足够的课本也没有，可是那时候热心科学春天的民众太热情了，我曾得到许多帮助，最夸张的一次，是一位大学的数学教师在医院遇到我，聊起高考，后来，他竟免费为我补习数学多次……

1978年夏末，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五年制的医学生。我搬进了医学院的宿舍，我们的寝室里，住着八位不同经历的学生，年龄从16岁到32岁！那是1978年，中国奇观啊，大学生从十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我们寝室最年长的大姐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结婚生子，经历丰富，她在高中毕业12年后，始圆大学梦。最小的妹妹是1978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当时是中学五年制，她刚到16岁，我居中，也24岁了。

当时兴奋未名的我，完全忘了卫校尚未毕业，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新生活。一天，晚自习归来，我发现希玲正独自一人坐在我们的寝室里等候，没说上二句话，她突然哭了，不能抑制自己的失望，无奈和无缘高考报名的落寞，她说不出话来，在我的新同学面前，希玲泪流满面。后来她索性伏案大哭，我们呆呆地，手足无措地望着她，我记得那天她一直也没有说什么，只是送给我一份礼物——一个精美的日记本和一条小手绢。手绢上印着一颗年青的女孩面庞，大大的，美丽的眼睛充满着憧憬，睫毛又长又弯，衬托着凝视前方的眼神……

我久久地为这份礼物感动着，不仅是难忘希玲，它也使我想起了李姐，想起了过去知青点和中学的好朋友们，我知道她们不止一个比我优秀，在正常的社会里，她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医生、工程师和教师。但是，在文革中的中国，她们没有太多的机会，我只是比一些朋友更勇敢，更执着、更心无旁骛，那时候我决心为代替她们而学习……

可贵的是希玲并没有放弃她的努力，79年她又报名高考，天不作美，她病了，需要手术，术后参加高考的她落选了，坚强的希玲，80年再战。她改考文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获城区总分前三名，录取外省重点大学。这只年轻的鹰终于飞起来了，她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工厂，算起来，她那年也应该是24岁。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多年来，我一直保留着她送给我的日记本，在第一页上，我记着当年的追求。

三十年过去了，一大群和我一样飞越大洋的当年学子，又聚在了一起，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意识到写下我们的故事和当年心境就是写下历史，当年全国“一刀切”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和停止高考并不是锻炼青年的途径，而是造成当时大量青年苦恼、无奈的原因之一。有机遇、有自由追求和选择未来的权利是幸福的，这正是我们这一代难忘高考恢复，难忘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因。对我个人来说，永远都会感谢1977年邓小平英明果断，感谢历史的机遇，带给了自己一个虽不成功辉煌但是丰富多彩的人生。

我真的不知道希玲，李姐和我过去的知青朋友会怎么回顾这三十年。在我批判性的眼光审视中，我永远会为那些善良清白，有能力，有追求的朋友最终未能一试身手，脱颖而出而惋惜，不仅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因为国家和社会的损失。我想不是不能上山下乡，但不可以每个青年都必须上山下乡；不是一定要参加高考，但不可以阻止青年追求高考，追求知识。青年们需要机遇、需要一试身手！从这点来说，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幸运得多，当然他们将怎样挥洒他们的幸运，就是他们的造化 and 权利了。无论怎么说，个人的努力总是我们在任何社会不可忽视的一环，比如我的朋友，经历过四次高考的希玲……

写到这里，遥望蓝天，我多希望希玲、我的朋友，这只追求理想，艰难起飞的鹰，现在正翱翔在祖国某一专业领域的上空。

回顾参与 ABC《人民中国的人民》三十年前后篇的拍摄

— 反思三十年文化视野的拓展

包秋

2005年5月，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资深记者科倍尔（Ted Koppel）在其主持的“晚间新闻”专题节目中播放了一部名为《三十年后新中国》的纪录片。它是该公司三十年前《人民中国的人民》的续篇。原ABC主播，现Ball State大学传媒系贝尔教授（Steve Bell）为续篇作了热情洋溢的解说，续片中剪辑了他们俩三十年前拍摄的大量片断予以比较中国三十年前后的变迁。

这部由ABC公司于1973年拍摄的《人民中国的人民》是中美关系解冻后第一部由美方拍摄、反映中国人民生活的长篇纪录片。这是一部特殊的纪录片：它拍摄于中美文化几乎隔绝的年代、记录了文革后期的特殊国情、拍摄时得到过国务院特殊的批准、并且在随后的三十年里，从未在中国放映过。因此，三十多年来，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此片拍摄的时间比中美建交还早五年，那时中美不仅没有外交关系，而且从1949年后中国政府就没有允许过任何美国媒体公司来华拍摄过中国。那么，三十年前ABC公司又是怎样拍摄此片的呢？

1973年的前篇——《人民中国的人民》

这一切还得从尼克松总统访华谈起。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初是中美关系的冰川时期，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华，打破了这个坚冰，当天下午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2月28日发表了标志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上海公报”。从那时起，虽然坚固的冰层开始解冻，但在美国大多数人的视野中，中国的冰层下还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而且它随时都有浪卷和吞噬美国的威胁。七十年代初的美国很少有人见过现代中国，那时的美国没有大陆电影，中国本身电影数量也不多，电视还未普及，而因特网还在美国军方和大学的科研室里。因此，美国人对中国大陆的了解恍如隔世。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在美国民众中掀起了一个小小的中国热，但由于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美国记者不能随意入华，按照当年的外交管制，要拍大型纪录片谈何容易。因此，美国多个媒体曾请示中美政府，要求入华拍摄现代中国，都因各种顾虑都被拒之门外。经过多次协商，最后，由国务院特批，允许美国当时的三大媒体公司各派一摄影组入境拍摄一个纪录片。

有了中国政府批准、美国媒体公司的许可，但完成此项任务还需要具有勇敢和执著精神的记者。事实上，这三大媒体公司中，完成纪录片的只有ABC。而此片由美国广播公司完成也绝非偶然，因为它驻香港记者站的先后负责人就是科倍尔和贝尔，他们就是当年领队拍摄《人民中国的人民》的记者。科倍尔1969至1971年任ABC驻香港记者站主任，随后任ABC外交记者。他对国际事务的激情和杰出能力使他日后成了世界上获奖最多的国际事务记者。贝尔于1972年接替科倍尔任ABC驻香港记者站主任，后成为ABC国际新闻的主播。（记者介绍摘自ABC网页）

美方拍摄团队入境后，可难为了各地基层干部。在那说句话都要考虑政治后果的年代，他们担心美国媒体会把某些落后状况无遮无盖全盘拍去，不加审查、随意加上解说就向全世界转播。他们又需考虑如何能在政治统一、但生活贫瘠的年代向外界宣传一个美好的中国。既要反映真实，又不能伪装。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外事政策是“外事无小事，样样要请示”，那在七十年代初还真找不到能请示并为此片定夺具体政策的官员。所以，拍片请示的程序也简单，一切拍着瞧。美方选择的主要拍摄地点是上海，也在其它各地拍摄了许多镜头，如北京的五、七干校、陈永贵领导的大寨、196部队的练兵和支农、乡村赤脚医生和知识青年等。因我参加的是上海地区的拍摄，所以此篇回忆的重点也是上海地区的拍摄过程。

上海拍摄的两个主题是大学生和工人。据贝尔教授2004年回忆说，当年首选大学生，主要是大学生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希望能从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看到中国将来的发展。因为对象是美国观众，不可能句句翻译，所以这些大学生还必须会说些英语。可是在1973年的上海，到哪儿去找会说英语的大学生呢？文革前的大学生早已离校、恢复高考是1978年，全上海只有复旦、同济和华东师大等校在1970年12月开始招收了少量工农兵学员。全上海最高就读年级是大学三年

级。因华东师大英语系学生最多、校园较好，任务就落到了华东师大。美方的要求是跟随一个班一星期，拍摄从宿舍、操场、饭厅到教室的全部校园活动，外加学工、学农和教学实习。那年，华东师大英语三年级有五个班，但在很大比例上使用毛泽东、林彪语录和政治新闻当教材的学生，哪一个班也不能单独地应付这样的实景考试。百般无奈之下，只能从各班抽出几位基础较好的学生，合并出一个临时小班，笔者就被指定为该班班长并协助设计和组织拍片过程。

说是设计，其实就是拿出上海当年接待外宾的第一套节目。当年工人阶级的代表是生产过万吨水压机的上海重型机器厂，代表农民的是马陆人民公社，市景的骄傲是比邻黄浦江的外滩一条街，当然还要拍摄学生从宿舍到食堂、从教室到操场的各种活动。摄制组跟着学生到马陆公社的田里去摘棉花，边访谈边拍摄，并实拍了农民给学生忆苦思甜的情景。公社干部告诉农民要忆旧社会苦，农民大妈说着说着就忆到了三年自然灾害苦。无奈之际只能不予翻译。想必美国的华人也听不懂上海土话。

教学实习是在淮海路上的淮中中学拍摄的。当时我还从未上过一堂教学法课，只听教师说国外正在流行“听说领先”法，也就边对照边创新地给中学生上了一堂课。那节课上了许多内容，实拍了 50 分钟。最后，收入纪录片的是一般的教学情景和我使用的马克思语录“外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因为此片拍得相当自由，拍摄过程中辽宁农学院张铁生罢考事件发生，美国摄制组又赶到辽宁，拍了张铁生后又回到华东师大继续拍。拍完了师大学生再拍工人。摄制组在重型机器厂用同样的执著，跟拍了工会干部钱冠华的一家。钱冠华是冶炼炉前的工人，妻子开高空大吊车，夫妇俩有一个四岁的儿子。当年一家的月总收入是 60 元人民币，当时一辆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都是 80 元，夫妇俩正在存钱想买一台缝纫机。

2004 年的后篇 —— 《三十年后的新中国》

光阴荏苒，一晃 30 多年过去了。贝尔教授告诉我，三十年来，他一直念念不忘中国，也一直有拍续篇的想法。后在访美教育代表团的鼓励下，他于 2003 年把《人民中国的人民》寄到了上海，要求寻找当年纪录片中的人物。上海市政府把片子寄到华东师大，华东师大认出了其中的两人。因笔者就是那两人之一，所以，片子又寄回美国。我协助写下了主要参与学生的名字、现在工作单位、当年拍片地点等。一切办妥后，当年的教师和几位校友被请回母校，2004 年 5 月，笔者也受到上海市政府和华东师大的邀请，回国协助拍摄续篇。我立即辞去暑期教学任务，高兴地回到上海去见证那三十年的巨变。

在华东师大的校园里，我再次遇到了已七十高龄的贝尔教授。虽三十年不见，可我们却一下子都认出了对方。三十年后共同的教授职业和对中国巨大变化的感叹使我们热情地攀谈起来。在贝尔教授拍摄的后篇里，原先灰蒙蒙的上海变成了彩灯闪烁、摩天大楼耸立的亮丽大都市，华东师大校园里当年蓝灰色的服装变成了五彩缤纷的时装。当年工农兵学员“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口号变成了个人的即兴发挥。取消了政治上的紧箍咒、没有了教条的套话，学生们尽情畅谈，谈理想、谈就业，个个踌躇满志。从国家到个人，从理想到实践，话题非常广泛，一直谈到某些陪同的干部抱怨有些学生谈得也太随意了。比如问及为什么要上大学，有一学生的回答是其母亲说进大学可找更好的男朋友。

重型机器厂钱冠华夫妇的变化更大。钱冠华夫妇在前篇中住的是一间灰暗的老式公房。厨房在过道里，烧着煤球。家里没有单独的厕所，卫生器皿使用的是马桶，住房外面全是农田。出门时把四岁的儿子放在自行车前的小椅子上，双双骑着自行车上班。当年为了在附近找一个较干净的公厕，拍片推迟半个多小时等着厂干部开车把送出去的美国摄制组人员再接回来。在后篇中，已退休的钱冠华夫妇住着三间一套的现代公寓，周围的农田早已建成了舒适社区。当年四岁的儿子已开了公司并有了一个六岁的孩子。家中轿车、电器一应俱全。物质的改善已让贝尔教授吃惊匪浅；全家三代人和谐的精神面貌更让他赞叹不已。贝尔教授在华东师大的多媒体教室中对学生说：“三十年前，我来过中国，到过上海，这儿很少摩天大厦、没有标志性建筑、缺乏活力、一切都是灰蒙蒙的”。他反复赞道，“中国真的变了，上海已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

三十年文化视野的拓展

贝尔教授带领的美国摄影组离沪后，上海“纪实频道”采访了主要拍片人员并以“三十年的见证”为主题，播放了中国，尤其上海三十年来的变迁。随着播音员冉冉的解说和徐徐翻开的历史画卷，笔者的心路历程也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个人文化视野的拓展缓缓展开。

三十年多年来，笔者经过了无数次个人和社会的文化冲突，每次交锋，既是一种体验，又是一次反思；既是一次整合，又是一次拓展。三十年前纪录片中那政治上天真、文化上幼稚、然而又真诚而执著的学生和实习教师是当年真实的我。那不仅是我，也是我们那一代许多人当时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在文革后期的中国，传统文化被贬为异端，政治与文化混淆不清，政治需要奇形地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并压制着传统文化。

这种政治上的压制和与文化上的混淆为生长在文革时期年轻人的思维和行为打上了那个时代强烈的政治烙印。学历的中断、知识的贫瘠、理论的混乱、社会的动荡，使我在年轻时失去了正规的高中阶段教育。在早期工农兵学员的英语教材中，没有系统的课程设置，教条的政治口号充斥教材。纪录片中所读和所唱的正是我们当年的真实写照。那时，我们英语系的各种教材中都没有对人性的探索、对人权的诠释、宏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被一笔抹去。以至1976年我去英国留学时，对中国文化的概念还是一片混乱。带着这样的政治烙印我们那批留学生在到达伦敦的第一个周末就去拜访了伦敦海格特墓地的马克思雕像；到达曼彻斯特，不会忘记瞻仰恩格斯寄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邮箱。加上回国途中在莫斯科红场拜访的列宁和天安门前的毛主席灵堂，倒也把马恩列毛拜全了。

然而，政治仅是党派和组织使用权力来决策的过程或概念，而文化是属于全民族的。它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在与自然搏斗和人文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奠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是解释其民族行为的蓝图。中华文明比我个人所经历和理解的内容要广义的多、深刻的多。我第一次对中华文化感到震撼的是在大英博物馆，国内很少见到的中国文物展满了几个大厅。许多在中国受批判的东西陈列在这儿受到参观者连连的赞叹。我开始观察他们赞赏的角度、聆听他们分析的语言并与自己的视野进行比较。对中国科技史发生浓厚兴趣是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的办公室里。李约瑟博士和鲁桂珍女士在他们剑桥大学的办公室向我们展示了李博士正在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倾听他对中国科技文明史的深邃理解和由衷赞扬大大加深了我对中华科技的崇敬，也开启了我对中华文化研究的热诚。

贝尔教授对中国三十年的巨变感到不可思议，那是他不明白中国是怎样一个勤劳、执著、谦虚和好学的民族。记得在中美建交前后，上海掀起了一个英语学习高潮，但那时学生众多，英语教师奇缺。为此，华东师大和上海广播电台就联合办起了广播英语教学。在我与翁贤清老师授课和辅导时，发现学生中还有三岁的娃娃和八十多岁的老翁。那年，上海广播电台和出版社一共卖出了一百万册英语初级班和中级班的教科书。这是一种我的美国学生永远也理解不了勤奋、好学和执著。

华夏文明的内涵远不止人民的勤劳、谦虚和执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在人生哲学、文学艺术、教育理论，自然科学和技术创造上对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唐诗宋词的文学瑰宝、积极的人生价值观和以社会责任心为支点的人本主义都是人类智慧宝库里的珍品。

然而，文化视野的拓展是个长期和反复的过程，新的挑战时会出现你的面前。我母亲的家乡离曲阜只有一小时路程。2007年我专程去那儿拜见教圣。1967年我到过那里，那时正值批孔高潮，除破旧的孔庙、孔林外，其余一片狼藉。现在，那里除了修缮一新的孔庙和孔林外，还建造了学寓意乐的“六艺城”、宽阔的街道和豪华的孔学博物院。瞻仰孔庙后，又漫步于树木参天的孔林。读着碑文、听着女讲解员对孔林的解说，不免又沉浸在中华文化的深思中。在领略孔学的精深时，耳边似传来了数万妇女的呼喊。原来，葬入孔林只是男性才有的殊荣。直到今天，孔姓男士死后还可葬进孔林，而那些正在解说的孔姓女儿媳妇们将被一律请出。不由想起孔子另一教诲，“唯女子与小人之难养也”。从孔林的反思又联想到世界上希腊、罗马、中东、印度等其他伟大文化流派。它们都源于不同的时代、受不同的地域和传统制约，都有他们相对的合理性，但又都是精髓和糟粕同存。即使最伟大的体系也不能例外。关键是后代如何继承和创新。

回顾三十年来笔者文化视野的拓展，我学到了什么？我学会了以文化的视野来审视自己和社会。从对中华文明支离破碎的理解到由衷敬仰，在敬仰的同时又学会冷静地反思，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欣赏和扎根于中华文明，扎根于受世界文明洗礼过的中华文明、扎根于与世界文明整合过的中华文明。这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也是一种个人的文化定位。我也在努力把这种文化定位和思维方式传给孩子。

近些年来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周末开车两小时把孩子送到华盛顿中文学校去上课，当教育教授的还教不了孩子几个汉字么？我说，那决非仅仅是汉字的原因，孩子更需要的是中国文化氛围来帮助他们形成心理深层的文化定位。孩子只有形成深层的文化定位才会在将来的发展中根深叶茂。这种扎根中华文明并能整合中、西方文明的深层文化定位是保证海外华裔孩子成功的心理基础。

三十年来，国家的飞跃、社会的进步、个人的成长使海外华人就像澳大利亚的飞去来器（Boomerang），飞出去又回来寻根，不断继承、整合、升华和创新。三十年的成就把贝尔教授也吸引回来，还不断地赞叹中国的巨变。有位作家说得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美制度和文化的都是人类生存创造的优秀模式。然而，它们却都有着偏颇。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感、使命感和儒家哲学造就了一个中庸至上的民族。这种特征对社会和谐和文化统一固然很好，但对培养下一代的独立思考和创业精神就有牵制。这种局限性在闭关锁国的时代并不紧迫，而在信息社会的今天，就会使下一代在高科技的竞争中受到限制。

今天，世界在能源使用、经济体系和科技发展等方面早已把全球连成一体。人类生存也面临各种新环境的严峻考验。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单独地战胜世界发展在能源开发、宇宙探索、生物医学和伦理诠释等方面的全面挑战。中国的和谐文化和美国崇尚创新和竞争的海洋文化有着极大的互补性。中美文化模式的借鉴和整合才会给全人类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契机。

可惜贝尔教授三十年后的续篇中没有拍到 2008 年的汶川地震和奥运会。中国在汶川大地震中展示的以人为本、全民救助的灿烂篇章是中华文明中人本主义在新世纪的实践和弘扬。那奥运会开幕式上 2008 人齐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场面在展现中华礼仪的同时也展现了中华民族何等的自信和自豪！那 32 根龙柱、唐宋元明清的书卷、巨型地球上的飞人，遨游宇宙后飞向点火台的李宁展现了中国从远古走来并拥抱世界的情怀。那 2008 个功夫小伙搭起的巨大绿色鸟巢象征了中国在能源、环保等方面视野的深远拓展。我相信，今后的三十年以至整个世纪，中国将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笔者期待着三十年后，再与 ABC 合作一次，拍个更辉煌的中国。

高考忆旧

张引

三十年前，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被中断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简称高考)制度恢复了。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终于看到了一个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改变命运的机会，不管是在工厂的，在农村的，在城市街道的，甚至是在部队的，一个个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那一年我22岁，高中毕业已经四年了。

这是一次迟来的机会，也是唯一能改变我命运的机会，我不会放弃的。我参加了两次高考就是明证。

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乱了。我于1963年秋天进小学，应该1969年秋天小学毕业进初中。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停课闹革命，到1970年春天我才得以小学毕业上初中。按照就近上学的原则，我被分配到了长沙市第二中学(即现在的长郡中学)。在毛泽东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下，初中只有两年，而且多半是在学工学农学军中度过。所以初中基本是荒废的。到1972年春天我们初中毕业了。

那一年的初中毕业进高中，长沙市搞的是所谓一刀切。1972年4月1日以前年满16岁的初中毕业生下农村，4月1日以后(含4月1日)年满16岁的上高中。我的生日是4月7日。于是我得以幸运的上了高中。更加幸运的是那一年我们遇上了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得以扎扎实实地学了一年知识。那个年代很多学校在农村都办有分校。长沙市二中的分校办在离长沙市五十多公里的路口公社。我们称之为路口分校。我的高中一年级就是在那里度过的。虽然是在偏僻的农村，但对于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的我来说还是很兴奋的。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学习的竞争以及竞争带来的乐趣。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老师们的积极性和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除开正常的教学以外，各个学科还大搞竞赛。语文有作文比赛，纠正错别字比赛。化学有默写分子式比赛。数学比赛就更多了。在各个比赛中我基本上都能名列前茅。记得那一年长沙市搞了一个全部6门课的统一考试(数，理，化，语文，政治和英语)。我在数，理，化和语文4门课上拿了满分。分校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对我提出了表扬。语文老师事后告诉我，他们语文组的3个老师都看了我的试卷，想给我扣点分，但连一个错别字也没找到。最后一至同意给了我满分。那次的语文考试不含作文，考的都是语文课本上的东西，所以拿满分是可能的。就这样在路口分校轰轰烈烈读了一年后，1973春天我们又回到了城里。这个时候政治气氛又变得紧张起来，特别是白卷英雄张铁生跳出来后，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遭到了彻底批判，我们又回到了无所事事的状态。就这样一直混到1974年春天高中毕业。

那个时候高中毕业的出路仍然是下农村。有几种情况可以留城：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无人，或身体不好不宜下农村(要有医院证明)。当然，你如果有权势，有门路，你也可以留城。我当时是因病留城。虽然没有下农村，但在城里根本没有工作机会。当时所有的工厂企业都是国营的，你根本就没有机会打黑工。找工作的必要条件是要有留城证。我虽然符合因病留城的条件，但不知什么原因直到两年后的1976年我才拿到留城证。所以这两年我就成了家里的伙头军(由此造就了我的一手烹调技艺)。1976年拿到留城证后就开始托熟人找工作。我父亲托他在教育界的朋友为我找到一个在长沙市第十六中学任代课老师的工作，教初中二年级的语文。教了一个学期后，我回到了我的母校长沙市第二中学，仍然任代课老师。先后教过高中语文，初中语文和初中数学。在这期间，中国的政治舞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三巨头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先后去世，然后是粉碎四人班结束文化大革命，再接下来就是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了。

大概是在1977年10月，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共中央关于高等教育招生制度改革的通知，使数百万像我一样的待业的或在业的青年看到了一丝光明的前途。大家义无反顾地，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了复习准备高考的热潮之中。那个时候大家学习的热情是现在的青年难以想象的。憋了十年的劲一下子都释放了出来。当时的学习条件比现在差远了。荒废了十年的教育界连本象样的教材都没有，更不要说好的高考复习材料了。于是大家各显神通，钻山打洞，四处找人，搞复习资料，

搞模拟考题。我由于在学校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能搞到各种复习班的开课信息，各种模拟考题，还有油印的复习资料，所以复习起来得心应手。很快就迎来了 77 年的高考。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搞得非常仓促，还没有来得及全国统一出题，是由各个省自己搞的。湖南省只考四门：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物理和化学合作一门）。我的四门平均成绩大概是 85 分左右，其中数学是 110 分（数学必答题 100 分外加两道附加题每题 10 分。我做出所有必答题和一道附加题。我还记得这道附加题是用数学归纳法证明一数学恒等式，是我在家当伙头军时自学的）。后来一位当年参加阅卷的二中的数学老师告诉我，那年全长沙市的考生中数学 100 分以上的只有 6 人。各位看到这里一定是为我高兴了吧。一定认为我是高中状元进入名校了吧。那你就错了。是的，这样的成绩当年进北大清华也是足够的，何况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数学系。当时我们填报高考志愿是在考试成绩出来以前，这样就需要考生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计。我对自己还是蛮有把握的。保守一点我没有填报北大和清华，而是选了复旦大学数学系作为第一志愿。复旦大学数学系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我认为以自己的实力还是能进得去的。但人算不如天算。我落选了。落选的原因后来听说是因为我父亲的所谓右派问题政审时没有过关。湖南省一向是以左出名的，在当时的环境下左派仍然当道。我就这样成了左派的牺牲品。这样也就有了我的第二次高考。

77 年高考的失败对我的打击很大。不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也不是因为自己太笨，而是由于自己无法掌控的原因而导致失败，这对我是不公的。但我没有因此放弃，我知道我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只有再次通过高考来证明自己，改变命运。这次我干脆断了自己的后路，辞去了在二中的代课老师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高考复习中去。现在回忆起来这段时间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段时间。77 年高考虽然没被录取，但我的实力已经被证明。很多人，包括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经熟人介绍）都找到我希望和我一起复习，共同探讨。这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我孩子他妈的那位。那时候大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到处找高考模拟题，恨不得把天下的题一网打尽。大家找到题以后都愿意到我那里一起研究。我的得意之处就是几乎没有我解不了的题。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复习，我又迎来了第二次高考。

78 年的高考是全国统一出题，考六门：数，理，化，语文，政治和外语，但外语不计入总分只作为参考。考试完以后又填报了志愿。这次我一不做二不休，要上就上最好的。我第一志愿填报了北大数学系。各位必须搞清楚一点就是当年的数学系可不象现在一样是冷门，没人愿意读。当年的数学系可是最热的大热门。这得归功于作家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它通俗易懂地介绍了数论这一古老的数学分支和数论中这个著名的猜想，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陈瑾润研究员为攻克这道难题，获取数学王国皇冠上的明珠而作的努力。这极大地激起了青年学子学习数学的热情。当年还历史性地举行了一次全国在校学生的数学竞赛。数学竞赛的优胜者后来大部分都进了北大数学系，成了我的同学。考试成绩很快下来了。我的五门平均成绩是 87 分左右，比上次略有进步，但数学却考砸了。数学只考了 78 分，是五门中成绩最低的。还好平均成绩还算可以。

这次我没象上次那样考完以后便高枕无忧睡大觉去了。我也展开了一些活动。当年湖南省的高考招生工作是在韶山进行。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韶山远离长沙等大城市，招生工作可以少受一些干扰；二是废物利用。在文革期间韶山作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是全国人民最向往的旅游热点。为了适应形势，韶山修建了很多宾馆。文革以后这些宾馆门可罗雀，因此就被利用作为湖南省高考招生的场所。在 1978 年高考招生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我从长沙坐上了开往韶山的火车。我把自己乔装打扮了一下，穿上了干净的衣裤，带上一副眼镜，拿着一个公文包。看上去象是一个参加招生的工作人员。就这样蒙过了宾馆的警卫，混进了进行招生工作的宾馆。我直接找到北大招生组，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特别是 77 年高考的情况，从公文包中拿出了一大迭我在家里解过的数学题以示我是多么的热爱数学。最后我终于被北大数学系录取，这次韶山之行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就不得而知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马开宗

越过了年头，我将是虚岁六十，若是将我们这一代所谓共和国的同龄人的生活历程分成两半，前后差不多都是三十年，差不多正好是中国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三十年。

人们常说，我们是倒霉的一代，在我们长身体的时候，碰上了“三年自然灾害”，以至我们的平均身体素质都差一点；当我们需要学知识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全体学校关了门；既然没得学上，那就找个工作挣钱吧，又是碰上了上山下乡，被撵到农村去干革命；一眨眼，混到了三十来岁了，该结婚了，计划生育成了百年大计，我们很荣幸地成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

头三十年对这整一代人除少数之外，大致上可以“三十年河东”来说是一视同仁了，该碰上该遭遇的都碰上了遭遇了，很难说相互之间有多大差别，后三十年可是河东河西不一样喽。就在那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区分的坎上（大致就是 77，78 和 79 年期间），在那事情起了极大的变化的关键时候，抓没抓住这个事后证明差不多是唯一的历史机遇，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以至于后三十年则对一部分人改天换了地去了“河西”，而相当一部分继续则留在了“河东”继续着倒霉的遭遇：自己上不了免费的大学而子女要上大学了则收费了，正当生活的担子加重的时候下了岗，等等。

差别延续下来是越来越大，放眼看去，党和国家领导人各地封疆大吏，大学里的教授博导，大型国企公司的 CEO 总经理，有多少人是这批人！可是，从另一方面看，马路上修自行车老头看自行车老太，无事所所靠打麻将下象棋打发日子，带孙子烧饭洗衣的，大多数还是这一帮年龄的人，这两拨同龄人的差别，究其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三十年前在十字路口往哪儿走了一步。

说了半天，再说到我自己，前面的近三十年大家倒霉我也不顺，直到 1977 的夏秋之际，一阵高考恢复的风刮了过来，这可是要紧紧抓住的机会，我就像那秋后的蚂蚱，拼足了全部的力道，使劲往上蹦了一下，第一跳的 77 级高考，蹦一下没跳过坎，咋办？此刻的我，有如过了河的小卒子，只有前进一条道了，变本加厉再跳一次，我这个人不算聪明，但形势逼迫也能一博，我也不算努力，但背水一战还能亡命，来年再战的 78 级高考，那真是最后的一跳了，居然跳成功了。有时我也在想，若不是这一成功的跳跃，现在的我在干嘛？大概也就是一个河南某工厂的退休工人吧。我丝毫没有瞧不起那些当时没去或没能抓到或抓好那个特别的转机的老哥儿们姐儿们，但毕竟因为那个挡口很可能就造成了“三十年河东”后是“三十年河西”或还是“三十年河东”的不同，实在是太大了，这是大家不得不承认。

考取了大学并不意味着万事顺利，只是有了个较好的起点，随后我在一家钢铁公司工作几年后，又大动了一下，来到美国洋插队，这叫土洋插队咱都经历过，个中滋味只有天知地知我知，不过好歹也熬了过来，现在诸事还算可以，值此纪念高考中美建交派遣留学生这三件大事的三十周年，心里就有这么些话想说出来，一碗白开水，仅供大家看看，过后就忘了吧。

看铁龙醒起

晓林

自从 1978 年四月中国铁道学会成立，开始把中国铁路建设从文革的阴影中带出来，到如今正好三十年了。在这段日子裡，中国铁路由蒸汽机车进步到世界最快的高速电联车和唯一的磁浮客运。笔者有幸，由 1977 年到 2006 年间，因为先后服务于美国铁道总署，直接参与很多中美铁道科技的交流，愿意在此与大家分享这三十年来的变迁。

虽然中国铁路由 1876 年开始兴建，但是当新中国于多年战争后，在 1949 年成立时，全国两万两千公里的铁路中，只有不到一半还能营业，而且包括很多不同的制度和设备。经过三十年的整建后，到 1978 年文革结束时，全国铁路已将近五万公里（包括电化铁路一千多公里），员工几近两百四十万人。全国机车约一万辆，其中蒸汽机车占百分之八十。客运量比 1949 年增加了八倍，占全国客运的百分之五十七。货运量比 1949 年增加了十九倍，占全国陆上货运的百分之六十四。可见当时铁路在中国交通方面的重要地位，以及铁道部远比交通部为大的理由。

破冰之旅

为了发展经济，中国了解他们必须先提高铁路的效率和运量。所以中国铁道部在 1978 年向在华府的世界银行提出贷款方桉和科技交流的计划。因为当时中美刚刚建交，很多官方来往的方式还没有定桉。所以两国铁路界的联络就由中国铁道学会和美国铁道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Railroads, AAR）负责。经过多次协商之后，组成了解放后第一个由美国访华的铁路代表团。除了我和美国铁道总署的首席法律顾问简目斯（Ray James，右五）外，其他八位都是美国铁道协会的成员。



图一，1980 年美国铁路访华团于北京明陵

团长是美国铁道协会主管科技的副总裁哈里斯博士（Dr. William Harris，左三）。其他几位是通用电动机车公司的巴贝（Frank Babel，右四），通用电气公司的贝里斯（Max Bellis，左二），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坎恩（Jack Cann，右一），南方铁路公司的克任恩（Stanly Crane，左一），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杰尔曼（John German，左五），美国铁路客运公司的哈克尼（Tom Hackney，右三），和切斯铁路公司的瑞奔（Dick Rayburn，左四）等，都是各大公司的领导人物。除了我们两个政府官员外，他们都有夫人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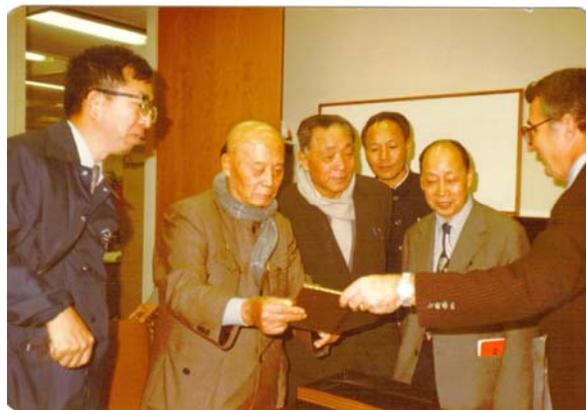
因为这是铁路界的第一次访问中国，大家都很慎重。1981 年五月三十一日先在西雅图集合开会，了解中国的情况和每个人的报告内容等。然后飞往东京过夜，于六月二日下午，搭巴基斯坦

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北京新建的国际机场，住进当时最好，也是唯一接待外宾，天安门广场边上的北京大饭店。次日到铁道部开始正式的汇报，由刘建章部长和各局局长亲自接待。双方就本国现有的铁路设备和营运问题提出简报，并特别在科技方面交换意见。

第二天开始，参观北京附近铁路设备和铁道科学研究院，由院长茅以昇接待。看到那十年文革对他们科技研究的影响。不但研究设备，院校房舍陈旧，科技人员间也有一个近十年的断层。在北京的五天裡，我们就铁路科技，营运方式 和安全规程上交换了很多具体，有深度的意见，并且同意继续支持他们的发展。同时，我们也抽出时间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如故宫，长城，天坛，颐和园等。令人印象最深的是满街的脚踏车，和几乎人人都穿深蓝或黑色的衣服。

六月八号，由铁道部总工程师谭葆宪陪同，搭机去昆明，然后转乘火车北上，经过风景美丽，工程艰巨的成昆线到成都，再继续到西安。除了参观古迹外，沿路在火车上并有各个铁路分局的工程师们做简报，一起交换信息等。在这一段铁路上，亲身看到他们自造的电动机车，柴油机车和老式的蒸汽机车。然后由西安飞北京转去杭州。两天后，搭火车到上海，结束了中美铁路科技的破冰之旅。如果再加上我个人回山东探亲之行，先后搭乘火车三千二百公里，同铁道部和七个分局的工程人员近百人交换意见，真正了解到中国铁路面临的问题。

同年十一月，在美国铁道协会出面邀请下，中国铁道部刘部长带了一个以局长级干部为主的代表团，以民间团体的身份来美回访。他们的老部长，也是当年铁道兵团司令的吕正操将军也以顾问的身份参加（图二）。从此，双方铁道科技人员开始互相访问。中国铁科院并有专家常驻美国铁路实验场，学习先进的测试技术。



图二，中国铁道吕部长（左二）和刘部长（左三）

科技交流

次年，美国铁道时代和国际铁道杂志出了一份中文版的刊物，并且主办了一个包括欧美科技专家的参访团于 1981 年十一月访华。笔者个人十月三十日离开华府，经韩城飞往香港，搭火车过罗湖桥到广州，共计四十多个小时。然后搭了两天一夜的卧车去北京与他们会合。一路上同列车上各式各样的旅客交流，深深地体会到铁路对老百姓的重要性。

因为这是个民间商业性的团队，就由铁道部对外服务公司安排到各地参访。在北京和科技人员座谈两次后，我们这个将近三十人的访问团，在铁道部外办的陪同下，由北京乘火车经过西安，成都，昆明，桂林到广州。在每个地方都停留两天，同当地铁路员工讨论问题，参观工厂等，但还是以观光的成分较重。旧地重游之外，还看了有名的桂林山水。在这次长达 7,700 公里的火车旅程中，了解到很多他们实际的问题，也同随车的铁路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随后的年代裡，双方的科技队伍常有来往，美国的厂家也到国内投资，提升了铁道的技术。

根据两次到国内实地参访的经验，于 1984 年六月再度应铁道部邀请回国时，不再跟团体一起，而是专程到铁道科学研究院，就他们重载列车的设计，做了个为期一週，有深度的报告。同时也再度提醒他们要早日兴建高铁，不要像美国那样依靠高速公路。这次回国，也是由香港搭火车入境，再乘火车去北京。但有太太和才十岁的儿子同行，让他们看看新开放的祖国景观。回程

时，还乘火车由北京到安徽的老家，上海，杭州，和她在厦门鼓浪屿的老家访问，看到一些听说过但没见过的亲友们。

到了九零年代，美国为了研究高铁和磁浮，做了很多评估和试验的工作，包括租借了德国和瑞典的高速火车在美国实地试车等。为了与他们分享美国的经验，笔者于 1994 年六月，同那时业已退休的哈里斯博士，再度回到铁道科学研究院做了一系列有关高铁的报告。然后到他们在兰州的分院，参观他们为了设计青藏铁路，所做的有关冻土和沙漠地带的研究。这次个人访华，没有搭火车，但是在回程时到日本访问日本铁路科技研究所等。五天中，由广岛到仙台，搭乘他们的高铁约四千公里之多。

经过几年的测试发展后，美国高铁终于在 1999 年开始营运。虽然最高时速只有 250 公里，而又只限于美国的东北走廊，但是不同于其他高铁的特点是，这种设备是根据美国铁路总署的安全规格所特别设计的，可以同货运列车在同一走廊上共同营运。所以在 2000 年七月随同美国铁路总署署长访华时，就把这些新的安全规章介绍给铁道部。因为当时中国正在推行企业化，所以也谈了很多美国如何管理民营铁路安全的程序和法规。随着国内航空业的发展，我们铁道总署的四个人在中国一週，只在由北京到西安是搭夜车，其他都是乘飞机了。

铁龙新貌

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铁路在过去几年裡也有飞速的进展。现在的七万八千公里的铁路线中，有三分之一是电化线。中国有世界百分之六的铁路，却承担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运量。当笔者于 2006 年六月退休前返国开会时，正赶上青藏铁路通车的仪式，全国欢腾。我们在上海也亲身领略到由德国发展成功，世界上第一个营运中，时速达四百三十公里的磁浮列车（图三）。除了上海机场线外，五年内，铁道部将延伸上海的磁浮到杭州。



图三，磁浮列车



图四，联动车

2007 年五月，我们几个七十岁上下的同学回国，搭乘着这世界上最高地区，由中外科技合作设计的火车，畅游青海和西藏。

今年五月，有机会重乘上海杭州间的铁路，看到新建的上海南站和快速舒适的新型柴油联动车（图四）。

今年八月，在奥运开幕前，中国正式进入高铁时代，新建的高铁电联车，以世界最高的时速 350 公里飞驶于北京和天津中间。北京与上海间的高铁也正在施工中，将在三年内通车营运。

三十年里，亲身参与并协助祖国的铁龙新建工程，使它由最古老的蒸汽机车，进步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磁浮和最快的高铁。在退休的岁月里，将继续把多年学来的经验，帮助它把我们亿万

我的少年班同学

- 纪念大陆恢复高考 30 年暨科大少年班创办 30 年

路 阳

1978 年，我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系，全班有 44 名同学，分别来自全国 23 个省市自治区，我们一起在安徽合肥朴素无华的校园中共同渡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大学时代，留下了终生美好的回忆。我们班有一个特殊群体的同学，就是来自少年班的 8 位天才少年。他们分别是第一期少年班的陈师众，管俊林，李平和第二期少年班的陈霖，魏德跃，卫浩然，王洲和周逸峰。

师众来自湖北黄石，大学时是我的下铺。师众除了功课学习，兴趣爱好极其广泛，桥牌围棋，诗歌散文等等，没有他不喜欢的，而且事事都有自己的主张，喜欢和人辩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非要辩得个正确结论。师众还爱好体育，排球打得很好。大学毕业后，他经由中美联合生物化学考试（CUSBEA）到美国，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获得博士学位，现在与妻子共同经营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和一本杂志。

俊林来自江苏南京，曾是共青团全国大会代表。俊林学习上有一套独特方法，学习不像我等吃力，但是门门功课的成绩都在全班名列前茅。俊林平时话不是很多，但是一句话可以让我记一辈子。大学毕业时，俊林获得了郭沫若奖学金。郭沫若奖学金是全国第一个以人名命名的大学奖学金，每个系仅有一位同学可以获奖，获得该奖是科大学生最高的荣誉。大学毕业后，他也经由中美联合生物化学考试（CUSBEA）到美国，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得博士学位，于麻省理工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到康乃尔大学去做教授，现在是密歇根大学的生化教授。俊林曾担任吴瑞学会（历届中美联合生物化学考试的考生和其它在美中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的生物化学家学会）的理事长。俊林诞育有两位千金，一位公子。

李平亦来自江苏南京，是一位长跑健将，中学和大学时常常跑越南京长江大桥。大学毕业时照标准照，经过仔细研究我的发式，讨论到底是二八开，还是三七开地分头，最后照了一张英俊无比的标准像。大学毕业后，他也经由中美联合生物化学考试（CUSBEA）到美国，在杜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后，现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员。李平诞育有两位千金。

陈霖来自四川乐山，长得英俊潇洒，说话风趣幽默，有四川人特殊的韵味儿。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完成博士学位，现在经营一家生物统计公司，陈霖诞育有一位公子。

德跃来自湖南长沙，很有思想。大学毕业后，经由中美联合生物化学考试（CUSBEA）到美国，在堪萨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浩然来自河南郑州，嘴巴极其能说，大有把死人说活的本事。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学习，获得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后又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在与妻子共同经营一家生物工程公司，资产规模不小。浩然饮水思源，在他的母校中学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奖学金。浩然诞育有三位公子，常与儿子们一起踢足球，还有一条爱犬。

王洲来自江苏张家港，在大学时虽然年龄不大，但很老成。大学毕业后，经由中美联合生物化学考试（CUSBEA）到美国，在匹茨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先到西北大学做教授，现在为匹茨堡大学的教授，泌尿系 DIRECTORFORRESEARCH。王洲诞育有一位公子。

逸峰来自江苏扬州，在大学时常有出人意表的作为，如在狂风暴雨中，胸藏两个馒头疾走如飞，远观好似一位妙龄女郎。大学毕业后，获得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所博士学位，现在为中国科技大学生命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青年科学家。

附上几张老照片以飨读者。照片一为科大第一期少年班的同学和科学家及校领导在一起。1，2，4，7，10 分别为时任科大党委书记的杨海波，副校长物理学家钱临照，物理学家马大猷，第二任校长严济慈，和数学家吴文俊。3，9 分别为当时被媒体广为宣传的宁铂和谢彦波。5，6，8 则分别是我的同学李平，陈师众和管俊林。



照片二是我们班在大学二年级五四青年节时春游览逍遥津公园，一排右一和右五分别是李平和王洲，二排右四和右六分别为周逸峰和陈师众，四排右一，右五，右六和左三分别是管俊林，魏德跃，卫浩然和陈霖，三排是我们班的十一朵金花，作者为一排右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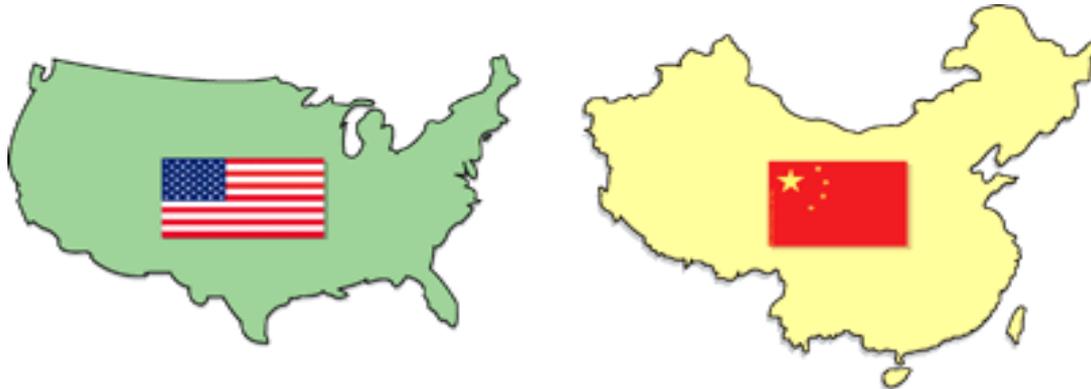


照片三是我们班不完整的毕业照。后排左一和左二分别是王洲和卫浩然。中排右六和右七分别是魏德跃和陈霖。中排左一是作者。

我们大学的 44 位同学中，有 35 位分别获得美国，德国，日本，瑞士，英国和中国的博士学位，6 位同学分别获得美国或中国的硕士学位，现在同学们已步入中年，分别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美国，中国，瑞士，德国和英国，为科学进步和人类文明努力工作，我们的经历折射出了中国这三十年的巨变和世界的变化。

我们同班同学中的 8 位天才少年，全部获得了美国或中国的博士学位，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科大的少年班办得非常成功，科大的少年班为早慧少年提供了一个早成才的优良环境。

这可真是：三十年间，沧海桑田；回首往事，感慨万千。



Host Committee (by last name)

Yuechen Chi, John Dickson, Zengjian Hu, Linchun Li, Yeqing Li, Minyue Lin, Patrick Lu, Tao Ni, Hua Wang, Jun Wang, Shuigeng Xiao, Yubin Ye, Lili Zhang

Committee Co-chairs: Shuigeng Xiao, Hua Wang, Yeqing Li

General Coordinator: Yubin Ye

Fundraising: Lili Zhang

Ticketing: Yubin Ye

Logistics: Minyue Lin

Thesis Contest Coordinator and Program Design: Zengjian Hu

Web & IT: Yuechen Chi

Hosting Organizations Sponsors:

The China Society

The Union of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The World Bank and IMF Chinese Staff Association

Supporter:

The Asia Society

Contact:

Shuigeng Xiao, 240-432-2912, shuigenxiao@yahoo.com

Yeqing (victor) Li, 202-294-6388, yeqing.li@gmail.com

Hua Wang, 703-328-3910, chenghuawang@yahoo.com

Zengjian Hu, 301-792-8576, huzengjian@hotmail.com